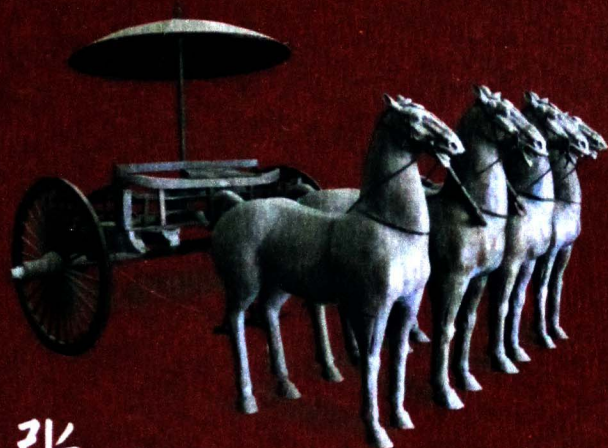




# 中国史纲

精装插图本



张荫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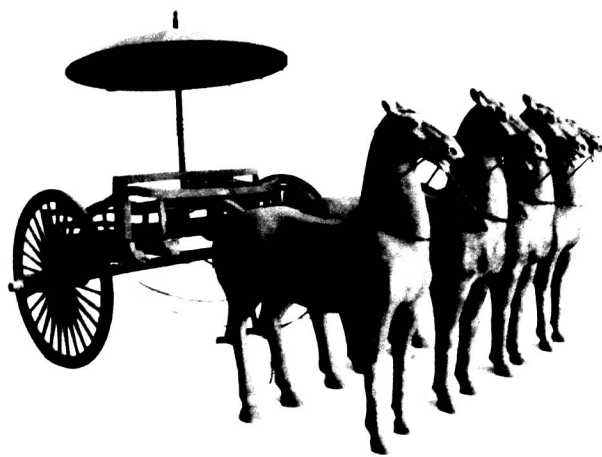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历史出版社



张荫麟 著

# 中国史纲

精装插图本



中国史纲  
张荫麟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史纲：精装插图本 / 张荫麟著. -- 北京：中国  
画报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46-0594-5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  
IV. ①K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1917号

# 中国史纲：精装插图本

---

出版人：田 辉

作 者：张荫麟

责任编辑：齐丽华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邮编：100048)

电 话：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qh1985@126.com](mailto:cpqh1985@126.com)

经 销：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监 制：傅崇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6

印 次：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6-05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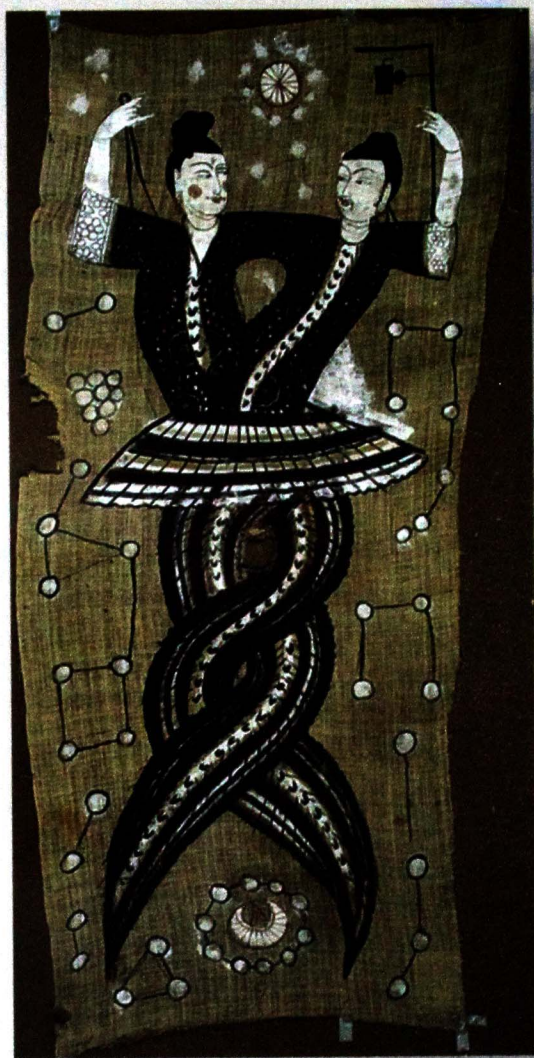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图注

在中国历史上，汉族一直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他们凭借着稳步发展的农耕经济，独步于时的封建文化，推动着中国多民族的融合和统一。汉族先民将自己关于创世传说、始祖活动、民族形成等社会活动记载并保留在历史典籍当中。在汉族的创世神话和传说中，流传最广的是伏羲和女娲的传说，这些传说反映了当时汉族的始祖夫妇，孕育后代、开启农耕文明的历史踪迹。



### 图注

商朝的农业和畜牧业、养殖业发展都很快，尤其是手工业，青铜器的冶炼与制造都相当纯熟。商朝青铜器不但数量众多、造型丰富而且品类繁多。单在酒器类中就有爵、角、觶、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盃、勺等二十多个器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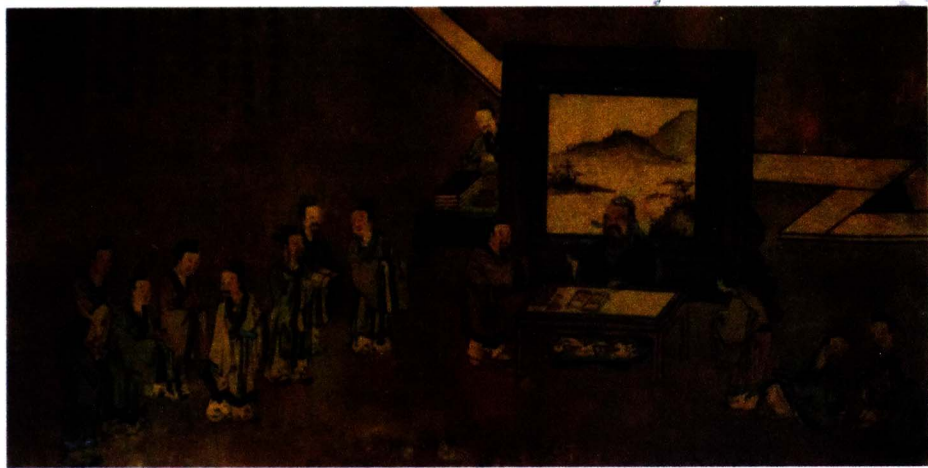


### 图注

殷墟遗址于20世纪上半叶被发现，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甲骨文和金文也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阴阳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空前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之为“百家争鸣”。



图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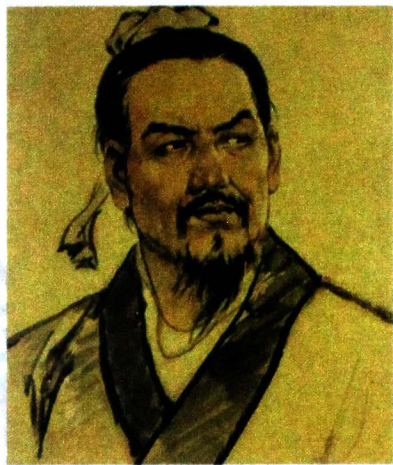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的理论的核心是“仁”。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百姓“足食”，国家“足兵”，取得“民信”。这种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也是他所提倡的道德观和伦理观。孔子首创私人教学，主张“有教无类”，认为不分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所以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



图注

孟子为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之一。在政治上他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在学说上推崇孔子，攻击杨朱、墨翟。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其著有《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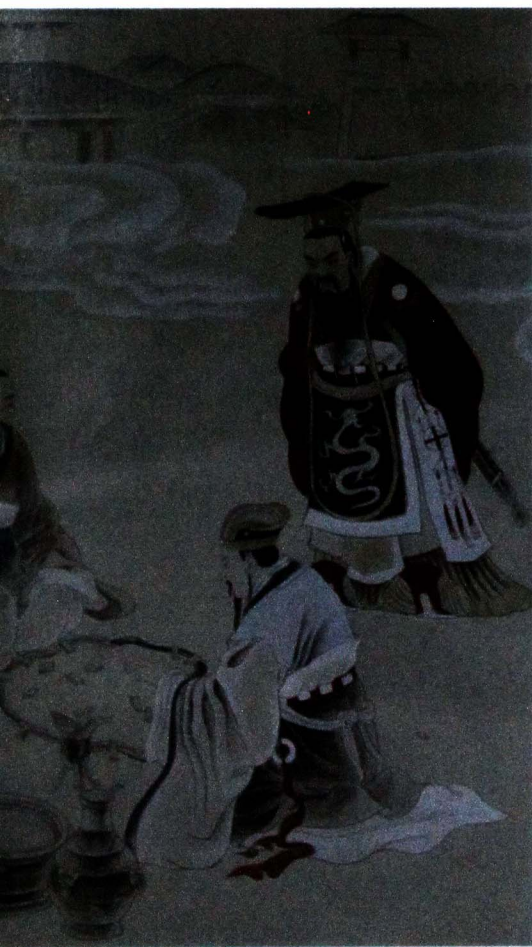


### 图注

法家学派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他主张“以法为本”“法不阿贵”；主张君主主要利用权术驾驭大臣，以绝对的权威来震慑臣民；还主张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国家大权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迎合了建立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

### 图注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把“道”抽象化，概括为普遍的无所不包的最高哲学概念。他还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利“天命”的绝对权威。老子的哲学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两方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途径是“守静”。政治上提倡“无为而治”。道家思想讲究一切顺其自然，不可强求，与儒家思想相反。



### 图注

“百家”中，以儒墨两派最有实力，当时有“非儒即墨”之说。墨家创始人墨翟，是战国初期鲁国人。他的思想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利益。墨子主张“兼爱”（爱一切人，不分“王公大人”和“万民”的阶级差别）、“非攻”（反对战争，在当时主要是反对不正义战争，反映了小生产者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尚贤”（主张任人唯贤，反对王公贵族的任人唯亲）。墨家思想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他的思想曾被其他学派广泛吸收征用。





图注 ▶

图为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秦兵马俑的发现为研究秦代军事、文化和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并以其巨大的规模，威武的场面和高超的科学、艺术水平，让世人惊叹不已。这也是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最好佐证。



图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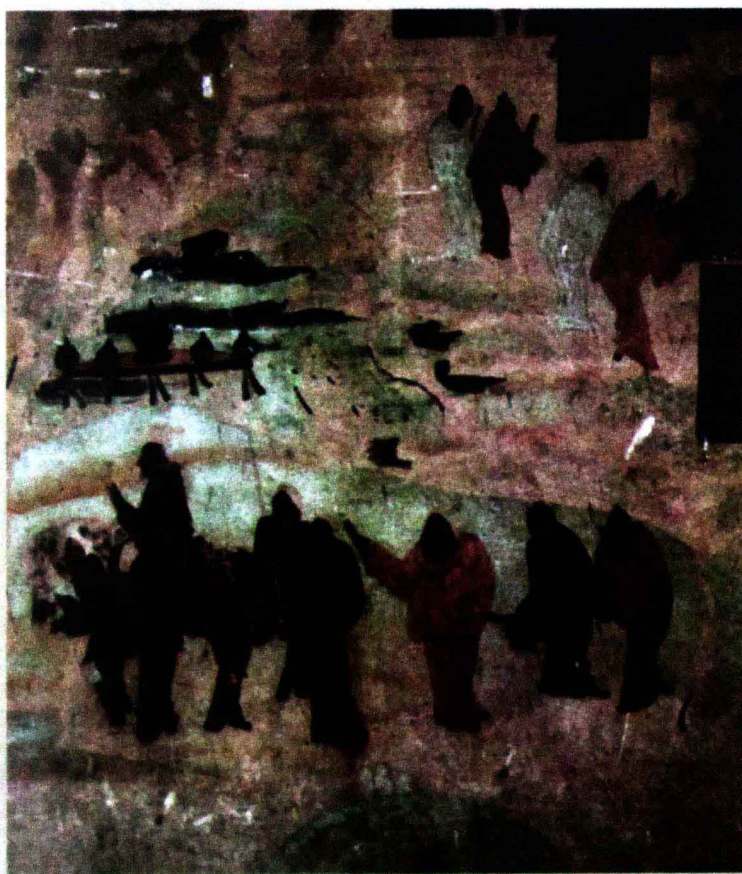
汉是秦的延续和发展，秦始皇和汉武帝的雄才伟略、文治武功都是空前的，后人于是用“秦皇汉武”来合称这两位千古皇帝。汉武帝凭借着“文景之治”所带来的雄厚的物力财力，及时地反击匈奴的侵扰。他在位期间，先后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 图注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自称“始皇帝”。秦始皇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其确立的一系列制度，被历代沿用两千多年。正是因为他，中国的朝代才有了最初的模式，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渐趋完善。秦始皇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修建驰道、长城、阿房宫，开拓疆土，他修建的万里长城至今依然屹立不倒，是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的最好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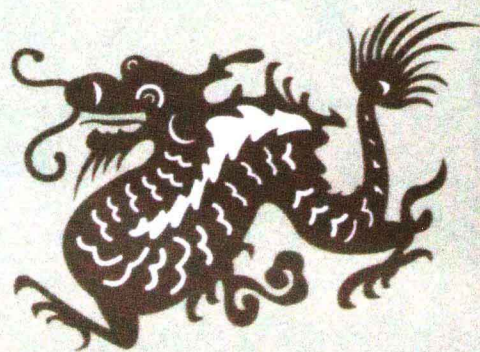
## 图注

汉武帝即位后，想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遂派张骞出使西域。他途经匈奴，西行至大宛，过康居，抵达大月氏，前后历时十余年才得返大汉。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西域诸国当时无史籍记载，张骞所报道，备载于《史记》、《汉书》中，是研究中亚史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 图注

此为《昭君出塞图》。汉初七八十年间对匈奴的政策是忍辱修好，而结果殊不讨好。当高帝在平城被匈奴冒顿单于围了七天七夜，狼狈逃归后，刘敬献了一道创千古奇闻的外交妙计：把嫡长公主嫁给单于，这是有名的“和亲”政策的开始。从高帝初年到武帝初年间，汉匈共修了七次“和亲”，昭君出塞为汉元帝年间。在后来的中国封建历史上，“和亲”也成为了一种非常常见的外交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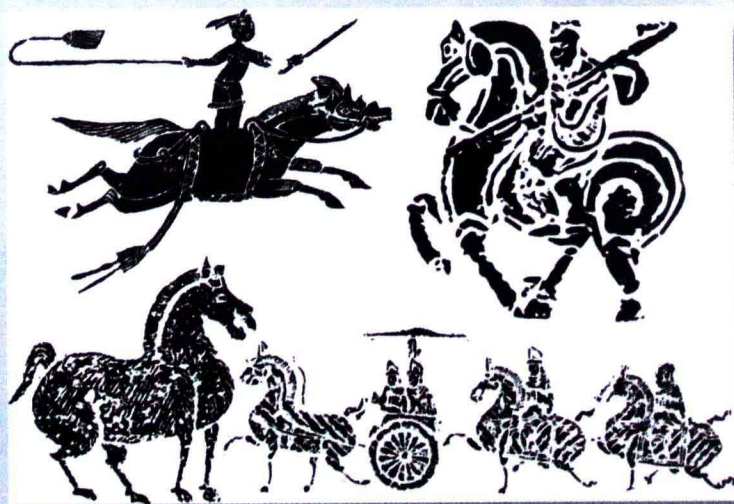
## 图注 ▼

平王东迁洛邑以后，西土为秦国所有。它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了西方强国。在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鲁，湖北的楚国，北京与河北北部的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强大起来，成了大国。于是，在历史上展开了一幕幕大国争霸的激烈场面。图为秦始皇陵出土的驷马战车，这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军事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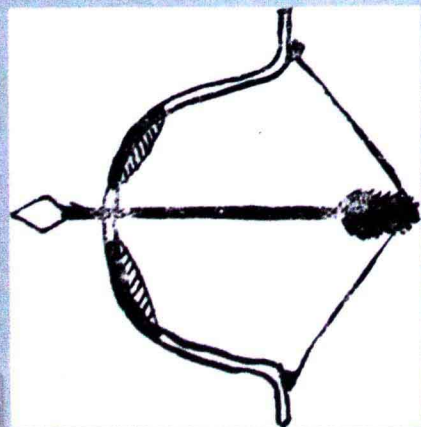
## 图注 ▶

图为汉代壁画中的战车和骑兵。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战争频繁，当时盛行车战，战车的多寡，往往是一个国家大小、强弱的重要标志。而在中国历史上，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出现在军队里，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骑兵都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军事力量。



## 图注 ▶

在冷兵器时代，弓箭是最可怕、最致命的武器。在中国，弓箭出现的时间，可以上溯到遥远的神话时代。弓箭的发明和改进使得人们能够在较远的距离准确而有效地杀伤敌人，而且携带和使用方便，可以预备许多箭，连续射击。可以说，直至火器诞生，弓箭都是战争中决定性的武器。







## 自序

这部书的开始属草，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二年，这部书的开始刊布，是在事变之后将近三年。

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于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于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四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过去的十来年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不幸这草昧初辟的园林，突遇狂风暴雨，使得我们不得不把一个万果垒垒的时代，期于



自序



# 中国史纲

不确定的将来了。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英贤，固尚有之；然而他们生产的效率和发表的机会不得不大受限制了。在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就，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

着手去写一部通史的人，不免劈头就碰到一个问题，以批评眼光去读一部通史的人，也不免劈头就碰到同一的问题，那就是，拿什么的“笔削”做标准？显然我们不能把全部中国史的事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地写进去。姑勿论一个人，甚至一整个时代的史家没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那么，难道就凭个人涉览所及，记忆所容，和兴趣所之，以为去取吗？这虽然是最便当的办法，我怀疑过去许多写通史的人大体上所采的不是这办法。无怪佛禄德（Froude）把历史比于西方的缀句片，可以任随人意，拼成他所喜欢的字。我们若取任何几种现行的某国或某处通史一比较，能否认这比喻的确切吗？但我们不能以这样的情形为满足。我们无法可以使几个史家各自写成的某国通史去取全同，如自一模铸出，除是他们互相抄袭。但我们似乎应当有一种标准，可以判断两种对象相同而去取不同的通史，孰为合当，孰为高下，这标准是什么？

读者于此也许会想到一个现成的答案：韩昌黎不早就说过：“记事者必提其要”吗？最能“提要”的通史，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为详略的通史，就是选材最合当的通史。“笔削”的标准就在史事的重要性。但这答案只把问题藏在习熟的字眼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什么是史事的重要性？这问题殊不见得比前一问题更为浅易。



须知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情实，摆在该物的面上，或蕴在该物的内中，可以仅就该事物的本身检察或分析而知的。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乃相对于一特定的标准而言。什么是判别重要程度的标准呢？

“重要”这一概念本来不只应用于史事上，但我们现在只谈史事的重要性，只探究判别史事的重要程度的标准。“重要”一词，无论应用于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较上，都不是“意义单纯”（Univocal）的；有时作一种意义，有时作另一意义；因为无论在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较上，我们判别重要程度的标准都不是唯一无二的；我们有时用这标准，有时用那标准。而标准的转换，我们并不一定自觉。唯其如此，所以“重要”的意义甚为模糊不清。在史事的比较上，我们用以判别重要程度的可以有五种不同的标准。这五种标准并不是作者新创出来的，乃是过去一切通史家部分地、不加批判地、甚至不自觉地，却从没有严格的采用的。现在要把他们尽数列举，并加以彻底的考验。

第一种标准可以叫做“新异性的标准”（Standard of Novelty）。每一件历史的事情都在时间和空间里占一特殊的位置。这可以叫做“时空位置的特殊性”。此外它容有若干品质，或所具若干品质的程度，为其他任何事情所无。这可以叫做“内容的特殊性”。假如一切历史的事情只有“时空位置的特殊性”而无“内容的特殊性”，或其“内容的特殊性”微少到可忽略的程度，那么，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新闻”，历史只是一种景状的永远持续，我们从任何一历史的“横剖面”可以推知其他任何历史的“横剖面”。一个民族的历史假若是如此，那么，它只能有孔德所谓“社会静力学”，而不能有他所谓“社会动力学”；那么，它根本不需有写的历史，它的“社会静力学”就可以替代写的历史。现存许多原始民族的历史虽不是完全如此，也近于如此；所以它们的历史没有多少可记。我们之所以需要写



自序



的历史，正因为我们的历史绝不是如此，正因为我们的史事富于“内容的特殊性”，换言之，即富于“新异性”。众史事所具“内容的特殊性”的程度不一，换言之，即所具“新异性”的程度不一。我们判断史事的重要性的标准之一即是史事的“新异性”。按照这标准，史事愈新异则愈重要。这无疑地是我们有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所采用的标准。关于这标准有五点须注意。第一，有些史事在当时富于“新异性”的，但后来甚相类似的事接叠发生，那么，在后来这类事便减去新异性；但这类事的始例并不因此就减去“新异性”。第二，一类的事情若为例甚稀，他的后例仍不失其“新异性”，虽然后例的新异程度不及始例。第三，“新异性”乃是相对于一特殊的历史范围而定。同一事情，对于一民族或一地域的历史而言，与对于全人类的历史而言，其新异的程度可以不同。例如十四世纪欧洲人之应用罗盘针于航海，此事对于人类史而言的新异程度远不如其对于欧洲史而言的新异程度。第四，“新异性”乃是相对于我们的历史知识而言。也许有的史事本来的新异程度很低，但它的先例的存在为我们所不知。因而在我们看来，它的新异程度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对于史事的“新异性”的见解随着我们的历史知识的进步而改变。第五，历史不是一盘散沙，众史事不是分立无连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单件的史事，并且要注意众史事所构成的全体；我们写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社会之局部的新异，并且要注意社会之全部的新异；我们不仅要注意新异程度的高下，并且要注意新异范围的大小。“新异性”不仅有“深浓的度量”（Intensive Magnitude），并且有“广袤的度量”（Extensive Magnitude）。设如有两项历史的实在，其新异性之“深浓的度量”可相颉颃，而“广袤的度量”相悬殊，则“广袤的度量”大者比小者更为重要。我们的理想是要显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



假如我们的历史兴趣完全是根于对过去的好奇心，那么，“新异性的标准”也就够了。但事实上我们的历史兴趣不仅发自对过去的好奇心，所以我们还有别的标准。

第二种标准可以叫做“实效的标准”（Standard of Practical Effect）这个名词不很妥当，姑且用之。史事所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者有大小之不同。按照这标准，史事之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愈大，则愈重要。我们之所以有这标准，因为我们的天性使得我们不仅关切于现在人群的苦乐，并且关切于过去人群的苦乐。我们不能设想今后史家会放弃这标准。

第三种标准可以叫做“文化价值的标准”（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s）。所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按照这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们写思想史文学史或美术史的时候，详于灼见的思想而略于妄诞的思想，详于精粹的作品而略于恶劣的作品（除了用作形式的例示外），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依据这标准。假如用“新异性的标准”则灼见的思想和妄诞的思想，精粹的作品和恶劣的作品，可以有同等的新异性，也即可以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史家无理由为之轩轻。哲学上真的判断和文学美术上比较的美的判断，现在尚无定论。故在此方面通史家容有见仁见智之殊。又文化价值的观念随时代而改变，故此这标准也每随时代而改变。

第四种标准可以叫做“训诲功用的标准”（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所谓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按照这标准，训诲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旧日史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标准。近代史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依作者的意见，这标准在通史里是要被放弃的。所以要放弃它，不是因为历史不能有训诲的功用，也不是因为历史的训诲功用无注意的价值，而是因为学术分工的需要。





例如历史中的战事对于战略与战术的教训，可属于军事学的范围；历史人物之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可属于应用社会心理学中“领袖学”的范围。

第五种标准可以叫做“现状渊源的标准”（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tions）。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则愈重要，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旨。然此事亦未可一概而论。历史的线索，有断而复续的，历史的潮流，有隐而复显的。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的心中。例如吾人今日之于墨翟、韩非、王莽、王安石，与钟相是也。

以上的五种标准，除了第四种外，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不过它们的应用远不若它们的列举的容易。由于第三种标准，对文化价值无深刻的认识的人不宜写通史。由于第五种标准“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再者要轻重的权衡臻于至当，必须熟习整个历史范围里的事实。而就中国历史而论，这一点决不是个人一生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所以无论对于任何时代，没一部中国通史能说最后的话。所以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这是无可如何的天然限制，但我们不可不知有这种限制。

除了“笔削”的标准外，我们写通史时还有一个同样根本的问题。经过以上的标准选择出来的无数史实，并不是自然成一系统的。它们能否完全被组织成一系统？如是可能？这是什么样的系统？上面说过，众史事不是孤立无连的。到底它们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同时的状况，历史的“横切片”的种种色色，容可以“一个有结构的全体之众部分的关系”（Relation between parts of an organized



whole) 的观念来统驭。但历史不仅是一时的静的结构的描写，并且是变动的记录。我们能否或如何把各时代各方面重要的变动的事实系统化？我们能否用一个或一些范畴把“动的历史的繁杂”（changing Historical Manifold）统贯？如其能之，那个或那些范畴是什么？

我们用来统贯“动的历史的繁杂”可以有四个范畴。这四个范畴也是过去史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部分使用的。现在要把它们系统地列举，并阐明它们间的关系。

（甲）因果的范畴。历史中所谓因果关系乃是特殊的个体与特殊个体间的一种关系。它并不牵涉一条因果律，并不是一条因果律下的一个例子。因为因果律的例子是可以复现的；而历史的事实，因其内容的特殊性，严格地说，是不能复现的。休谟的因果界说不适用于历史中所谓因果关系。

（乙）发展的范畴。就人类史而言，因果的关系是一个组织体对于另一个组织体的动作，或一个组织体对其自然环境的动作，或自然环境对一个组织体的运用（Action）或一个组织中诸部分或诸方面的交互动作（Interaction）。而发展则是一个组织体基于内部的推动力而非由外铄的变化。故此二范畴是并行不悖的。发展的范畴又包括三个小范畴。

（1）定向的发展（Teleological Development）。所谓定向的发展者，是一种变化的历程。其诸阶段互相适应，而循一定的方向，趋一定鹄的者。这鹄的不必是预先存想的目标，也许是被趋趋于不知不觉中的。这鹄的也许不是单纯的而是多元的。

（2）演化的发展（Evolutional Development）。所谓演化的发展者，是一种变化的历程，在其所经众阶段中，任何两个连接的阶段皆相近似，而其“作始”的阶段与其“将毕”的阶段则剧殊。其“作始”简而每下愈繁者谓之进化。其“作始”繁而每下愈简者谓之退化。

（3）矛盾的发展（Dialectical Development）。所谓矛盾的发展





# 中国史纲

者，是一变化的历程，肇于一不稳定组织体，其内部包含矛盾的两个元素，随着组织体的生长，它们间的矛盾日深月显，最后这组织体被内部的冲突突破而转成一新的组织体，旧时的矛盾的元素经改变而潜纳于新的组织中。

演化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矛盾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各可以是同一事情的两方面。因为无论演化的发展或矛盾的发展，都可以冥冥中趋赴一特定的鹄的。惟演化的发展与矛盾的发展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这四个范畴各有适用的范围，是应当兼用无遗的。我们固然可以专用一两个范畴，即以之为选择的标准，凡其所不能统贯的认识为不重要而从事舍弃。但这办法只是“削趾适履”的办法。依作者看来，不独任何一个或两三个范畴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便四范畴兼用，也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更不用说全部的史实，即使仅就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而论。于此可以给历史中所谓偶然下一个新解说，偶然有广狭二义：凡史事为四范畴中某一个范畴所不能统贯的，对于这范畴为偶然，这偶然是狭义的偶然；凡史事为四范畴中任何范畴所不能统贯的，我们也说它是偶然，这偶然是广义的偶然。历史中不独有狭义的偶然，也有广义的偶然。凡本来是偶然（不管狭义或广义的）的事，谓之本体上的偶然。凡本非偶然，而因我们的知识不足，觉其为偶然者，谓之认识上的偶然。历史家的任何是要把历史中认识上的偶然尽量减少。

到此，作者已把他的通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纲领表白。更详细的解说不是这里篇幅所容许。到底他的实践和他的理论相距有多远，愿付之读者的判断。

二十九年二月昆明

张荫麟